

中国海洋经略的演进

洪翔

(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古代中国“重陆轻海”乃因农耕经济、陆地边防压力、朝贡体系及传统“和合”文化观念的综合影响;近代中国“以海卫国”则是发展海洋经济、完善海防体系的必要性以及西方海洋思想冲击的结果;当代中国“陆海统筹”战略的生成则是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三大需要。中国海洋经略从目的上呈现由“趋利为主”向“避害为主”再向“趋利避害”演进的特征;从内容上呈现由“注重海洋安全”向“注重国家安全”再向“统筹国家安全与海洋发展”演进的特征;从形式上呈现由“浅显认知”向“初步探索”再向“系统部署”演进的特征。

关键词:中国海洋经略;海洋强国;成因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4-0008-07

马克思指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17}因此,观察研究历史现象,“不仅要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2]34}。当前研究海洋强国战略同样需要把握中国海洋经略演进的整体性。一方面,当前中国正处于经略海洋的关键时期,建设海洋强国必须从中国经略海洋的完整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切勿将其进行历史纵向切割;另一方面,当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近代及当代经略海洋的成因及其演进特征分析存在一定的学术空白。因此,厘清中国经略海洋的历史成因及其演进特征对于贯彻与落实当代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古代中国“重陆轻海”

古代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对土地非同寻常的依赖性。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到:“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3]94}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在陆海二者间优先选择陆地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中国的海域自古以来十分辽阔,但是中国人却与之交集甚少。古代中国实施“重陆轻海”政策有其内在的多种原因,结合当时社会特定的自然

地理环境以及人文地理环境,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分析“重陆轻海”经略的成因。

(一)经济层面:农耕经济能够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求,海洋经济依赖性不强

第一,古代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国家经济支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粮食种植技术成熟发达,正是因为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一方面能够满足国内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古代封建统治者能够通过苛捐杂税保证中央财政的收入,从而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自然而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这也是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中国当时的农耕经济较为发达,粮食产量能够满足国内需求,没有必要开展对外航海贸易。而“中国则能从与西北政权的交易中,获得国内产量不足的马匹及其他畜牧业产品”^{[4]68}。这说明中国对于内陆一些物品的需求远大于海外粮食贸易需求,导致对于内陆的依赖性强于海洋,所以对内陆的征服与统治欲望比海外扩张更加强烈。

(二)政治层面:维护陆地政权的成本投入较高,征服海洋精力相对不足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地理位置优越,海陆疆域辽阔,中国成为了东亚地区的核心战略区域,一方

收稿日期:2019-11-09

作者简介:洪翔(1994—),男,安徽安庆人,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面古代中国王朝常年承受来自国内的政权争夺压力,对内的战争资源消耗较多,另一方面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压力。当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陆地政权而消耗的国家资源不计其数,这就导致国家的财政负担较重,如果需要发展海上贸易或者扩大王朝版图而发动海外战争兼并海洋国家,则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力人力,建设海上军事体系,这种战略谋划的费用支出是当时统治者所不愿承担的。

第二,若是实施海陆兼顾战略,海外战争必会消耗大量国家资源,从而会削弱统治阶级对于陆地政权的掌控能力。所以,统治者便无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再加上中国古人在不断的战争与建国的经验中锻炼出了较强的陆地军事组织能力与行政管理能力,因此中国古代统治者更偏向于以“陆地文明”为主的国家统治模式。

(三)文化层面:古代朝贡体系的广泛盛行,“和合”文化占据主流地位

第一,朝贡体系的施行是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方式,统治者主张以礼尚往来的交流方式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这种方式比起西方的殖民掠夺与侵略扩张更加彰显中华民族的文明。虽然古代中国存在一系列的海上探索活动,但是这些海洋探索却基本上没有以侵略扩张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朝贡体系的建立来证明封建王朝的合法性,这些海上活动大多是以巩固政治关系、稳固国家政权为主导,并非以获得利润为目的,因此古代中国利用海洋只是将其作为推行朝贡体系的媒介平台,对于海洋领域的其他需求并不强烈。

第二,中国向来奉行“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和合”文化,当时国家的外交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力展现中华民族礼仪之邦“以和为贵”的文化魅力,从而提升儒家的文化软实力,以文化优越感使海外各邦国臣服,所以古代中国统治者更愿意以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强势特点吸引海外政权的主动依附,以一种胸怀天下的开放姿态增强海外政权对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归属感,促进附属藩国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精神依赖性。因此,正是由于古代中国海洋观具有“包容性防御”的特点,古代中国统治者对于海外政权的征服欲望并不强烈,更倾向于对其表现出天朝上国的礼仪性而非掠夺性。

二、近代中国“以海卫国”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与思考海洋对于国家兴衰的意义所在,开始挖掘海洋更深层次的战略价值,想建立一套“以海卫国”的国家发展体系,这也是海洋强国思想在中国近代的萌芽。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世界形势,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分析近代中国“以海卫国”经略的成因。

(一)经济层面:发展海洋经济建立经贸制度,调节对外贸易矛盾

近代之前,中国历来推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清朝延续了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对于海洋这条天然对外的贸易通道,封建统治者只将其视作防御外敌的“万里长城”。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重新审视海洋与国家的内在联系。从经济层面来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近代海洋思想的萌芽。

第一,建立海上贸易制度调节对外贸易矛盾。西方列强的入侵目的主要表现为实施殖民掠夺,谋取经济利益,因此近代中国海洋经济思想的萌芽体现在发展海运以及海商,认为只要建立一套海上贸易体系,通过改善海上经贸关系来调节与西方列强的贸易矛盾,通过正常的货物贸易来阻止鸦片对中国的倾销,满足了列强在贸易上的经济利益,就可避免战争的再次爆发,避免国家走向衰亡,这是近代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外部因素。

第二,海洋的经济价值利国利民。当时国家只重视内河漕运的建设而忽视海洋的经济利益,而海洋的经济价值远不止于鱼盐之利、舟楫之便,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实行海禁政策而没有利用海洋。魏源认为海洋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这表明近代中国开始意识到开发海洋的经济价值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这是近代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内部动因。

(二)政治层面:完善海防体系抵御列强入侵,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民亲眼见证了海洋成为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便捷途径,近代中国对于以海卫国经略探索的另一重心旨在建立一个体系完备的海防战略,其核心思想在于“防”。以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意识到海洋的战略价值。“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

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船不可。”^{[5]61}“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6]47}从洋务派的观点可以看到,被动“避害”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洋务派极其重视海洋的防御,因此从政治层面来看,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是近代中国海洋思想萌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洋务运动的发起旨在建立近代中国的海上防御作战体系,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旨,积极学习西方的海军、海防建设体系,以国内的海洋运动“回应”国际的海洋冲击,试图依靠海洋来卫国乃至强国。因此“被动防御”的国防思想加速了近代中国海洋思想的萌芽,这是近代中国发展海防体系的外部因素。

第二,近代列强的殖民掠夺致使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中国人民对于腐朽政权信任全无,国内革命运动高潮迭起,当时封建统治阶级面对内忧,不得不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开展近代的海洋改革运动,一来是为了稳固民心;二来是发展与海洋相关的现代实业来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这是近代中国发展海防体系的内部因素。

(三)文化层面:封建主流文化遭到外来冲击,接触西方海洋文化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1]43}鸦片战争的爆发给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虽然战争的硝烟将中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反观历史发展的进程与趋势,中国封建制度的瓦解具有必然性,鸦片战争只是一个具有导火索性质的随机历史事件。因此,鸦片战争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契机,它是打破古代中国“重陆轻海”经略的开始。而世界列强们在多次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促使中国人海洋意识猛醒,为近代中国经略海洋提供了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冲击了传统的“重陆轻海”思想。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禁海拒交的落后外交理念的禁锢,随后甲午中日海战摧毁了国人寄予厚望的海防体系,再次使清政府被动感受到了自身经略海洋的意识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陆权国家”的思维模式遭受质疑,倒逼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进一步反思并挖掘海洋的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进步。

第二,传播了先进的“海洋强国”思想。清政府国门打开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长期的技术、商品贸易交流中拥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西方领先的“海洋强国”思想理念以及设计先进的舰船装备,这给近代中国“重陆轻海”的治国理念敲响了警钟,同时近代中国“重陆轻海”战略体系与资本主义列强“海洋强国”战略体系现实交锋的结果也使得近代中国人民开始认清世界的整体趋势与近代中国的现实需求。

三、当代中国“陆海统筹”

“海洋是国家繁荣、与外界通商贸易、扩大势力和发挥影响的一条途径。”^{[7]1}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8]56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构想开始以海洋强国经略作为重要依托,此后海洋强国经略逐步得到深化与推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迎来了经略海洋的重大机遇期。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9]。因此,随着国家发展的需要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海洋利益日渐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结合中国国情与世界局势,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来分析当前我国“陆海统筹”战略的成因。

(一)经济层面:统筹陆海经济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依托

对于立志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中国来说,如长期局限于陆地范围内的经济利益,不但与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时也无法通过海洋这条便捷径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中国经济的带动引领作用,削弱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第一,海洋经济缓解陆地资源危机。江泽民同志早就指出:“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陆地资源短缺的情况将日益加剧,势必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0]182}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陆地资源量消耗巨大,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有效地挖掘海洋资源逐渐成为支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二,海洋经济优化中国经济结构。早在

2003年中国正式发布了第一个海洋经济发展的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这表明海洋经济的开发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海洋经济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2004年胡锦涛同志也提到：“海洋开发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促进海洋开发和经济发展。”^[11]201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发展海洋经济。随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12]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随着对海洋经济开发工作的逐步重视，海洋经济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补充与推动的作用逐渐呈现。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有机衔接是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海洋经济推动建成海洋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时强调：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13]。当代中国必须走向海洋，发展海洋经济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与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海洋的开发建设，尤其是海洋经济的发展，自他从沿海开始工作便强调海洋经济是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十八大以后，海洋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当前中国海洋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才能创造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海洋经济真正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才能使中国落实“依海富国”战略，全面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

综上，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需要以及建成海洋强国的内在要求来看，统筹陆海经济发展是其重要依托。

(二)政治层面：统筹陆海国防体系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依托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海洋强国体系逐步完善，经略海洋的能力迅速提升。美国作为全球海洋秩序的“主宰者”，为了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一方面加强海上战略通道的管控力度，并且试图通过联合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亚太地区海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海上战略辐射；另一方面在南海及东海相关岛屿归属问题上，鼓动怂恿周边邻国与中国不断升级争议摩擦制造紧张局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国必须加速构

建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体系以保障我国海洋权益的完整性。

第一，统筹陆海国防体系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具体要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沈阳战区部队时便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视察海军建设并强调新形势下中国海军的部队建设的重要性，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充分认识到海军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海洋强国建成的外在表现就是海军力量的发展与壮大。现代化海军的建设体系则代表了国家海洋强国建设质量的高低，将现代化的海军建设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以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来保障中国广泛的海内外利益，这进一步为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统筹陆海国防体系是提升海洋意识的重要表现。中国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4]。这表明当前必须要提高国家总体安全的意识，将国家总体安全与我国海军的海上战略部署有机融合，将海洋战略体系同样作为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保障，使其成为我国总体安全的重要依托。海洋意识的提升在于挖掘海洋的战略价值，而统筹陆海国防的战略规划则表明了中国在经略海洋方面有了历史性突破，这是对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准确判断与把握的结果。

第三，统筹陆海国防体系是坚持总体安全的必要手段。从地缘角度审视，总体国家安全是陆地安全与海洋安全的整体结合，保障海洋安全就是保障我国对外贸易、交流、开放通道等的安全，所以海洋安全同样决定着我国总体安全系数。“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5][16]}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陆海国防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必须统筹完善陆域与海上国防建设体系，这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要求，也是预防与面对现代化战争的必经之路。

综上，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看，统

筹陆海国防体系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依托。

(三)文化层面:统筹“一带一路”是构建命运共同体,传播“和合”思想文化的重要依托

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及寻求合作的重要途径,这条贸易通道被誉为全球古代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在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上,古代中国为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族在历经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不中断地孕育与滋养后,使当代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导向、利益追求,彼此呈现出了“同核异形”的显著特征。

在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过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构建方式,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前世界以及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审时度势地向世界各国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倡议。海洋不仅是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天然纽带,更是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交流合作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一方面提升了海洋的通道价值,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尤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合纵连横的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也将推动海洋与陆地便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的双向互动促使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和人民,这是历史的呼唤,更是现实的诉求。

第一,统筹“一带一路”是传播“和合”文化的内在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在深刻洞察世界发展趋势的前提下,由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丝绸之路”体现了中国人博大的“和合”文化。在现阶段,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人类文明飞速发展,伴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涌现,人类征服海洋的梦想愈发强烈。这个时代人类必须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利用海洋和发展海洋文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来意图认识海洋、征服海洋的梦想即将扬帆起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以其更快的速度,推动人类思想的解放,形成一条体现中国价值观的特色文明带。古代丝绸之路秉持“以和为贵”的共存理念,在于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

化的合作交流。而21世纪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对于古代丝绸之路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将中华优秀的“和合”文化以新的方式继续发扬与传播,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中亚国家、东盟国家的精神文化交流,提升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增强了文化竞争力,是践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的重要体现。

第二,统筹“一带一路”是推行“中国思维”的渠道拓展。“一带一路”充分遵循“亲、诚、惠、容”的交流方式,精妙地规避了海洋争议等敏感问题,在足够关注和尊重其他国家海洋利益的前提下打造沿线的命运共同体,这更能被沿线国家接受与认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致力于优化世界格局的建设能力,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引导性越突出,“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则越大,中国国际地位与吸引力则会得到显著提高与增强。因此,通过统筹“一带一路”,中国不仅能进一步科学部署陆地发展规划,还能在世界范围内引领海洋价值的开发。因此“中国思维”传播渠道也变得更加广阔,这是发出中国声音,优化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战略。

第三,统筹“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创新。中国政府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种共享发展的合作理念,不仅给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便利,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展现的这种“共赢”的思维方式与古代“和合”的文化内涵达到了完美契合。“一带一路”倡议是打破传统“重陆轻海”思维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它不仅重视陆地的作用,还强调海洋的时代价值。它以一种更加宽阔的“海洋视角”重新审视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式,这其中海洋扮演着与陆地同样重要的角色。它更加密切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极度彰显了海洋的战略价值,这为打造层级更高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途径。

综上,从构建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合”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统筹“一带一路”是其重要依托。

四、中国海洋经略的演进特征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585}正如马克思这段话所指出，因为历史背景、现实条件的不统一，才造就了古代、近代与当代中国经略海洋的差异性。中国经略海洋的历史由三个时代构成，如果只将其思想与实践置于各自的历史舞台，那么它们只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片段，但若是将中国经略海洋的演进过程及各自特点串联起来形成线性整体进行研究，也许能参悟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未来走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从“进程性海洋强国”向“结果性海洋强国”的转变。结合古代、近代以及当代海洋经略的思想与实践，可从目的、内容以及形式上分析中国海洋经略的演进特征。

(一)目的上：从“趋利为主”向“避害为主”再向“趋利避害”演进

首先，古代中国虽然实行的是“重陆轻海”的政策，但也没有完全放弃探寻海洋的利用价值，在维护巩固陆地政权的基础上，在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往来、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曾借用海洋这个天然通道，将海洋作为其陆地战略的延展，因此古代中国对海洋呈现了一定“趋利”的态度；其次，清代禁海政策的推进导致对于海洋战略价值的挖掘几乎为零，基本把海洋视作防御外敌的“天然长城”，表现出了主动“避害”的态度。近代中国大门被打开以后，统治阶级仅仅将海洋视作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便利捷径，围绕海洋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希望能应对海洋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因而导致近代中国的海洋经略的核心在于防御海洋之害；最后，当代中国关于海洋的思考与实践结合了古代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洋经略的经验教训，将“趋利”与“避害”有机结合，不仅重视海洋给当今中国带来的挑战，而且也主动把握海洋给中国带来的机遇，积极开发利用海洋的战略价值，从“趋利避害”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海洋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探寻国家海洋需求与大国崛起的良性匹配模式。

(二)内容上：从“注重海洋安全”向“注重国家安全”再向“统筹国家安全与海洋发展”演进

首先，古代中国对于海洋需求并不强烈，古代

中国相对比较注重维护海上朝贡贸易往来，保证与其他海洋国家的和平交流，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国家海洋领域的安全是其唯一的关注焦点，对海洋的发展并没有过多的精力投入，显然古代中国认为海洋安全比海洋的发展更加重要；其次，近代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才清醒认识到国家海洋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对于海洋安全问题有了一定的意识并将其付诸实践，洋务运动建立并发展了近代海防体系，开始尝试把海洋安全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筹划海洋经略；最后，当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内容不仅注重海洋的安全问题，同时兼顾海洋的发展问题，我国的海洋经略不仅重视现代化海军的建设，而且还努力发掘享受发展海洋所带来的时代红利，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样是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规划，陆海统筹的思维模式说明了当代中国注重统筹海洋的安全与发展问题，而这刚好是未来继续实施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方向与路径。

(三)形式上：从“浅显认知”向“初步探索”再向“系统部署”演进

首先，虽然古代中国对于海洋的利用较早并且有过较多经略海洋的历史记载，但是其海洋认知仅仅停留在其所具有的发展朝贡体系的辅助性上，仅仅是利用海洋通道加强与海外政权的政治互信与交流合作，巩固其“重陆轻海”的国家战略，对于海洋其他领域的开发利用微乎其微；其次，近代中国对于海洋的认知相对于古代中国有了一定的进步，力图救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海洋经略的改革之路并付诸一定的实践，但其海洋经略是被动反思，仍然属于重陆轻海的衍生品，对于海洋的认知依旧停留在浅显层面；最后，当代中国海洋经略是在历史警醒与现实需求的双向推动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洋的战略价值，提出“陆海统筹”的重大决策，将当代中国的海洋经略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化、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与其他战略相辅相成构成当代中国科学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对于海洋的理解与把握更加吻合世界整体海洋发展趋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海洋经略的演进在形式上总体呈现了一个不断自我完善与更新的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吴英.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马克思·韦伯. 儒教与道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M]. 王荣芬,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4] 马克·曼考尔. 清代朝贡制度新解[M] // 费正清.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的对外关系. 杜继东,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9.

[6]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7] J. R. 希尔. 英国海军[M]. 王恒涛, 等译.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7.

[8]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孙中山全集: 第2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7] (2019-10-1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10] 江泽民. 江泽民论国防与军事建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1] 胡锦涛: 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04-04-05(2).

[12]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2-11-17] (2019-10-20). http://www.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13] 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N]. 人民日报, 2013-08-01(1).

[14] 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 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N]. 人民日报, 2014-06-28(1).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cean Strategy

HONG Xiang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a's "emphasizing the land and scorning the sea" is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border defense pressure of land, tribute system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 of "harmony". Modern China's "defending the country by the sea" is the result of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marine economy, perfecting the coast defense system and the impact of western marine thought. The 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trategy of "coordinating the land and the sea" is based on the three needs of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dherence to the overall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s ocean strategy shows the following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ts objective evolves from "drawing on the advantages mainly" to "avoiding the disadvantages mainly" and then to "drawing on the advantages and avoiding the disadvantages". Its content evolves from "emphasizing the marine security" to "emphasiz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n to "coordin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rine development". Its form evolves from "superficial cognition" to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then to "systematic deployment".

Key words: China's ocean strategy; ocean power; cause of formation

(责任编辑 雪 箫)